



江西师范大学
史学文丛

思想文化 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

S Sixiang Wenhua

Y Yu Jindai Yilai Zhongguo Shehui Bianq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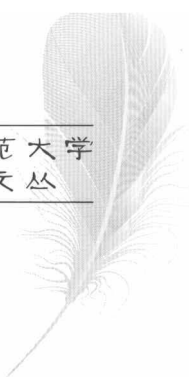
社会思潮研究

思想家研究

思想文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性研究

张艳国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西师范大学
史学文丛

思想文化 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

Sixiang Wenhua
Yu Jindai Yilai Zhongguo Shehui Bianqian

张艳国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文化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 / 张艳国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5004-8724-1

I. ①思… II. ①张…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③社会变迁—研究—中国—
近代 IV. ①B25②K250.3③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9129 号

策划编辑 王 茵
责任编辑 储诚喜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3.75 插 页 2

字 数 397 千字

定 价 5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师范大学史学文丛”总序

方志远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

—

文化进程总是和经济发展同步。

岱岳齐鲁的富庶，孕育了孔孟诸贤；中原大地的繁华，造就了三晋英豪。关中的沃野千里，更营造出汉唐雄风。

尽管徐孺子在东汉被称为“南州高士”，但自中原视之，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江西尚为“蛮荒之地”。陶渊明的横空出世，应是江西的意外之喜，所以当王勃乘着酒兴龙飞凤舞地写下“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时，人们还是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对热情主人的客套恭维。而且，将“徐孺下陈蕃之榻”作为“人杰”的例证，如果不是客人的过于随意，也说明主人实在提供不了太多让客人称道的素材。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江西开始不动声色地向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区域行进。

唐中期开始发生的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大运河的开发利用，彻底改变了国内的交通格局、经济格局和文化格局。而在这个格局的改变中，受益最大的无疑是江西。^① 本来夹在吴楚文化之间，说是“吴头楚尾”却既非吴又非楚的江西，在这个时期超越“荆楚”，与

^① 关于这一问题，详见笔者《江西通史·明代卷引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另见许怀林教授《试论宋代江西经济文化的大发展》，载《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吴越”一道成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同时又与“湖湘”共同构成中国最稳固的粮食生产基地。

所以，当人们正为晏殊父子蜚声词坛而钦羨、为欧阳修独步文苑而仰止、为王安石策划国是而疑惑之余，更加惊讶地发现，后面接踵而至的，竟然是长长的一列的一流文化人：曾巩、黄庭坚、陆九渊、周必大、杨万里、姜夔、文天祥、马端临、吴澄、朱思本、周德清、解缙、杨士奇、吴与弼、罗洪先、魏良辅、颜钧、何心隐、汤显祖、朱耷（八大山人）、蒋士铨。当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江右文化大军，连同着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江右王门以及《文献通考》、《岛夷志略》、《广舆图》等等，密集而持续地产生影响时，怎么可能不让人叹为观止，“文章节义之邦”、“家孔孟而人阳明”之美誉遂纷至而踏来。^①

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造就了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是文化的繁荣、教育的普及为传统农业和手工业提供了技术和人文层面的支持。“淡水浸铜法”、《禾谱》、《茶经》、《陶录》，特别是《天工开物》，既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又为技术的进步提供了启示。丁文江院士在20世纪初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矿产资源进行考察后，解释了当年身为“县学教谕”的宋应星竟然能够编著《天工开物》这样一部图文并茂的工艺百科全书的原因：“先生生于豫章，广信之铜，景德之瓷，悉在户庭。滇南、黔、湘冶金采矿之业，又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天工开物》之作，非偶然也。”^②

明清时期的“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是江西为中国历史发展作出的又一贡献。前后五百年间，数百上千万的江西人口涌向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成为持续影响当时中国整体经济社会的重大事件，他们在这里开垦荒地、发掘矿产、交流物质、传播文化，与广东、福建、湖广等地移民和土著居民一道，造就了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对近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至今仍然遗存的几百处江西会馆（万寿宫）、临江会馆（萧公庙、晏公庙）、吉安会馆（文公庙）、抚州会馆（昭公祠）、药帮会馆（三皇宫）……见证了当时的辉煌。

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皇帝因收缴“伪书”发布“上谕”：“江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4《哲宗》；（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江西》；（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20《朱子建宁门人并交友》。

② 丁文江：《奉新宋长庚先生传》，载武进陶氏编《天工开物》。

苏、江西、浙江省分较大，素称人文之薮，民间书籍繁多。”^①可见直到此时，江西仍然是公认的经济文化发达之域。

但也就在此时前后，江西缓慢了自己行进的步伐，不仅落后于吴越，且开始被湖湘赶超。特别是“五口通商”及京汉、粤汉铁路开通之后，国内交通格局和经济格局发生了大运河通航以来的根本性变化，江西从交通格局的“中心”被甩到了“边缘”。从外部涌入的新思潮、新风尚、新的生产方式，绕过江西，或沿广东、湖南、湖北，或沿上海、江苏、安徽，向中原挺进和扩散，致使江西在理念的更新和经济的转型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线上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交通格局中的边缘化以及理念转换、经济转型的迟滞，直接导致了江西近代文化的落后。

虽然在20世纪，仍然产生了陈寅恪、吴有训、傅抱石这样伟大的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但从整体上来说，江西的文化地位与经济地位一样，相对一骑绝尘的吴越、早已国门洞开的闽粤，以及民风大开的湖湘，其封闭与落后，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

1940年，江西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中正大学的创建，成为江西文化教育复兴的一大契机，也是江西在抗日烽火中给全国展现的文化曙光。

国立中正大学的首任校长、国际著名植物分类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先骕博士在就职演说中为学校描绘了远大的前景：“从校长以至同学，每一个人都应有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要使本校成为国内一个最好的大学，在‘三中’（按：指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中正大学）中取得最高地位。”

虽然校长对于学校远景的描述不无鼓舞人心的苦心，但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期盼已久、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它的感召下，大批江西籍及外省学者云集中正大学。历史系也是人才济济，他们之中，有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卓尔不群的逻辑学家吴士栋，有梁启超先生的高足、著述等身的目录学家姚名达，有清华十人史学小组发起人之一、兵制史和经济史家谷霁

^① 《清高宗实录》卷1304，乾隆五十三年（1788）。

光，有对学术一丝不苟、锱铢必较的度量衡史和秦史专家谢康，有追随西南联大南北奔波、毕业于清华研究院的明清史专家欧阳琛等。他们以自己的文章气节，开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求真务实的学术传统和献身社会的人文精神。

七十年的风雨历程，胡先骕校长为学校描绘的远大前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实现。学校发展屡经曲折，名称也几番变更：始由国立中正大学改名南昌大学（1949年），再经院系调整改名江西师范学院（1953年），最终定名为江西师范大学（1983年）。其间虽然不乏杰出学者和优势专业，但从整体上说，由“国立”中正大学而为“省属”江西师范学院、江西师范大学，虽然是“省属重点”，但其地位的“边缘化”已经成为客观事实。更为严重的是，这一边缘化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江西的一所高校、一个个体的边缘化，而是江西的高等教育、江西的文化事业，从晚清以来所经历的再度边缘化，其后遗症迄今没有消除。而高等教育、文化事业的再度边缘化，对于江西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致命性的，但迄今同样没有引起决策者的高度关注。

虽然如此，江西千百年来培育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依然在激励着江西师大的师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经过长期的努力，将学校建设成为拥有三个校区、4400亩土地，融教育学、哲学、文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理学、工学等九大学科门类及音乐、体育、美术等特殊专业于一体，有全日制本科生近4万名，博士、硕士研究生近2800名，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后流动站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省属重点大学，学校发展正在显示出良好态势。

在迎来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既无博士点，也非教育部重点基地的历史学的学者们，仍然可以问心无愧地向校庆献上他们的贡献。

一方面，他们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在今天江西的土地上，县级以上中学的高中部，每100名历史教师，有近70个毕业于江西师大历史系；在江西的市县级博物馆馆长中，有一半以上曾经受训于江西师大历史系。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江西师大历史系为各重点大学和科研院所输送了近500名硕士研究生和一大批博士研究生。

另一方面，他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探索。黄今言的《秦汉赋役制度研究》、《秦汉军制史论》、《秦汉商品经济研究》，许怀林的《江西史

稿》、《江西行政志》，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梁洪生的《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张艳国的《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梁民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研究》，邱新有的《村治中的宗族》等，都是集多年研究的力作。而11卷近500万字的《江西通史》的完成和出版，更集中展示了这个学术群体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国江南腹地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贡献。

经过多年的努力，通过“送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培养和引进了一批具有扎实专业基础和较大学术潜力的青年学者。在30多位专任教师中，有28人取得了博士学位，他们来自京、津、沪、宁、汉、穗及其他各地高校，在较高的学术平台上，潜心研究，形成了一支颇具声势的学术新军。他们是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的当然传人。

万振凡《弹性结构与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以1927—1937年江西农村革命、改良冲击为例证》、陈晓鸣《中心与边缘：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1858—1938）》、游海华《重构与整合：1934—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谢宏维《和而不同——清代及民国时期江西万载县的移民、土著与国家》、李平亮《卷入大变局——晚清至民国时期南昌士绅与地方政治》等著作的整体推出，既反映了这批中青年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预示着这个学术群体由“单兵作战”到“集群作战”的进步。

三

在国立中正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我们选编了这个学术群体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近百篇论文，结为江西师范大学史学文丛出版，作为向七十年校庆的一个汇报。

《国家制度与古代社会研究》收录了方志远、陈晓鸣、谢宏维、温乐平等人的14篇论文。这些论文从具体的个案入手，对秦汉、明清时期国家制度与社会结构、国家财政与地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

《苏区革命与农村社会变迁》收录了万振凡、游海华、邱新有、戴利朝等人的 22 篇论文。这些论文以苏区革命为中心，分别对苏区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江西为中心的农村社会变迁进行讨论。

《思想文化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收录了张艳国、王员、刘劲松、蒋贤斌等人的 28 篇论文。这些论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演变的互动关系以及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度透视。

《地方历史文献与区域社会研究》收录了梁洪生、李平亮、游欢孙、廖华生等人的 14 篇论文。这些论文通过对民间文献的收集和解读，以江西为重点考察对象，对宋代以来区域历史进程与社会生活变化作出了新的解释。

《史学观念与欧美社会研究》收录了梁民愆、张艳国、孟海泉、徐良、李昌新、杨长云等人的 20 篇论文。这些论文对于欧美社会的史学观念和社会文化内涵，进行了历史考察和现代审视，并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参照系。

这套史学文丛与建校 65 年选编的《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术论文集》不同，前者试图展示本学科的学术传承，所以收录吴士栋、姚名达、谷霁光、谢康、欧阳琛等老一辈学者的论文，而今次所收录的，均为在职学者的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学术境界、学术方法上的追求和进步。

论文的结集出版，其实是一件十分奢侈而艰难的事情。所以，作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一院之长和作者之一，当我承担写“总序”任务时，并没有太多的快感。

出版经费的筹措颇费周折，但方方面面的支持令我们感动。如果一一列举其中的友情和热情，反而显得客套和俗气。

主要的顾虑倒是，时代的发展，学术的进步，有多少成果能够真正经受时间的磨砺？敝帚自珍的些许创见，投放于中国学术和世界学术的长河之中，是否算得上是沧海一粟？

但是，沧海正是由点点滴滴而汇成，经典也是由平平凡凡而凝练。当这些点点滴滴汇入涛涛巨流，当这些平平凡凡融入传世经典，小我也就成了大我。设想，如果没有大批像江西师大历史学这样的非“985”、非“211”院校学者们的艰辛努力，中国近三十年历史学科的发展是难以想

象的。

徐孺子当年的影响力比起陈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徐孺子既没有因为身居“蛮荒”之地而自暴自弃，也没有因为陈蕃为其下榻而受宠若惊。而他的自尊自强、宠辱不惊，竟然成为此后江西文化、江西学术的核心品质。从这一点来说，王勃在《滕王阁诗并序》中的赞赏或许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詎知这批成果的结集出版，不会成为江西历史学振兴的前兆？

一念及此，稍稍心安。权作序。

作者谨识

己丑岁末

目 录

“江西师范大学史学文丛”总序·····	(1)
---------------------	-----

社会思潮研究

论中国近代的历史哲学研究·····	(3)
困扰近代中国民主思想观念的四个问题 ·····	(17)
简论辛亥首义文化 ·····	(26)
评孔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	(37)
试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	(50)
再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	(69)

思想家研究

简析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 ·····	(89)
论孙中山的中国文化观·····	(110)
孙中山对待新文化的态度平议·····	(123)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131)
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探析·····	(148)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	(163)
关于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想起点问题·····	(170)
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比较研究论析·····	(177)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思路与方法评析·····	(191)

邓小平与中国文化传统·····	(201)
从张灏研究讨论关于思想家研究方法问题·····	(217)

思想文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性研究

社会转折关头的正统心态

——清皇室贵族集团复辟与尊孔关系探讨·····	(231)
尊孔与袁世凯复辟·····	(242)
排孔开新与国民性改造·····	(267)
国性论、国粹论与文化的排孔开新·····	(279)
五四新人的文化性格与评孔开新·····	(296)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转折·····	(313)
科学、史学与近代中国的意义危机·····	(325)
南京参议院议员人数与《临时约法》的效力·····	(338)
美国所退庚款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	(343)
民国时期美国对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	(351)
中基会对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历史贡献·····	(358)
后记·····	(366)

社会思潮研究



论中国近代的历史哲学研究

张艳国

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史学形态与一种方法论的历史哲学在近代产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在欧洲出现完整的、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正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为养料的，例如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而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发展则不然。虽然在晚清经世实学中，也曾有过近代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的萌芽，但是，它终究伴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悲惨命运而步入了近代社会的坎坷道路。自从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坚船利炮为开路先锋，轰开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壁垒，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便以军事与经济并举，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历史发展逼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轨道。这样，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进入资本主义文明的模式被摧毁了，因此，中国近代便没有产生强大有力的资产阶级，因而也没有产生独立形态、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的形成，是以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为沃壤的。由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艰难性与特殊性，也就没有产生完全形态的中国资本主义文化。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历史学，也是如此。不幸的是，由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的特殊性，萌芽于晚清经世实学中的中国自己的近代历史哲学便被扼杀在摇篮中了。幸运的是，唯其中国近代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灾难重重，出于救亡、启蒙、变革的需要，资产阶级中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①，学习、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这其中也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特别是像康有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为、严复、梁启超等人，他们对于建设中国近代的历史哲学是积极的、勤奋的，而所取得的成绩也大体上代表了中国近代历史哲学所能达到的水平。这样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格局：一方面，中国近代没有产生于本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独立发展的、呈完整形态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另一方面，近代中国也不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这样，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就具备了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性质——“移植的”和“不发达的”，以及特点——“不成熟性”和“不充分性”^①。具体释证如下。

一 取法西学

在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变革、新旧嬗递的时代里，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为了服务于改良变法、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目的，学习、研究近代西方国家与近代日本的历史，同时，直接学习并翻译、介绍西方的历史哲学。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贯穿于中国近代改良、变法、革命的几个阶段，都有大量编译、研究西方近代历史、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史与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著作：70年代，王韬撰有《普法战纪》、《法国志略》、《扶桑游记》等；80年代，黄遵宪撰有《日本国志》，王之春撰有《谈瀛录》，姚文栋撰有《日本地理大要》，王泳霓撰有《道西斋日记》，陈家麟撰有《东槎闻见录》等；90年代，康有为撰《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日本明治变政记》、《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严复译《天演论》。世纪之交，编译之作更如雨后春笋，其中，通史性译著有《万国历史》、《世界通史》、《万国兴亡史》等；断代史有《世界近代史》、《世界近世史》、《十九世纪革命时代》等；专题史有《法兰西革命史》、《美国独立战争史》、《英国革命战史》、《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欧洲外交史》、《十九世纪外交史》、《万国宗教志》、《东西洋伦理学史》、《万国商业史》、《英国商业发达史》等；历史哲学有《史学通论》、《世界进化史》，以及严译《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铨》、《法意》等。

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接触、学习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理论与方法，有如获三军之喜，兴奋感慨交集，跃然纸上。黄遵宪说：“取卢梭、孟德

^① 参见张艳国《略论中国史学的流变》，《中州学刊》1989年第6期。

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① 梁启超也感触道：“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② “思想为之一变。”^③ 梁启超的重要历史哲学著作《新史学》，有相当部分取源于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源论》，而该书的主要历史哲学观点，则又采自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章太炎学习了近代心理历史学后，便对此极表赞同，并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④。总之，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对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理论与方法的学习，是热切和勤奋的，对它的介绍、编译也是积极和主动的，他们希冀对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引进、移植，促成中国旧史的近代化，从而促成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近代化。如此，他们一方面为了向洋先生讨变世之教，软弱地回避了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家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作的大量歪曲性、诬蔑性的“哲学思辨”；另一方面，他们忍辱负重，尾随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之后，亦步亦趋，从事建设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研究工作。

二 “史界革命”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为了建立历史哲学，取法于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确立时所运用的革命方式，向中国封建史学展开了猛烈批判，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鸣锣开道。

对于中国旧史的批判，贯穿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研究的始终。其开初是不太自觉的，因而表现出软弱性，也比较零星；至于戊戌以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痛感到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对于建设中国近代文化的巨大阻碍作用，对于确立近代史学价值观念与理论体系的相反作用，便慨然揭起了“史界革命”的旗帜：“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⑤ 对中国封建旧史的批判，要数“史界革命”最有声势，最有影响。“史界革命”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① 参见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

②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论学日本文之益》。

③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三十自述》。

④ 参见唐文权、罗福慧《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9页。

⑤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